



黑土地上的石油史诗

□蒋玉伟

松嫩平原的褶皱深处，沉睡的黑色黄金被地壳运动推搡着涌向地表。当第一道钻机的轰鸣刺破荒原的寂静，这片被称作“北大荒”的土地便有了新的姓名——大庆。我的父辈们总说，这里的黑土会说话，你听，钻杆撞击岩层的叮当声，是大地讲述的古老情书。

1960年的寒潮裹挟着西伯利亚的霜刃，将三十万建设者的脚印烙进冻土。父亲褪下染血的戎装，和来自天南海北的汉子们用体温焐热冰天雪地般的井架。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深夜，柴油灯在帐篷布上投下摇晃的光晕，铁锹与钢钎碰撞出火星，像洒落在雪原上的星星。

“会战不是打仗，胜利打仗！”王铁人的吼声震落电线杆上的冰凌。工人们嚼着冻成石头的窝头，手心攥着烧红的螺丝帽取暖，硬是在这片连野兔都啃不上草的荒滩上，让黑色油流喷薄成冲天火炬。那年我未出生，却在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掌纹里，触摸到了那个沸腾时代的温度。

童年是浸泡在原油气息里的童话。清晨跟着母亲去井站送饭，总能在输油管上发现新结的蜡花，像是大地馈赠的水晶首饰。父亲工具箱底层的“光腚糖”，裹着层层蜡纸，甜味早已混着机油味渗进记忆——那是物资匮乏年代最奢侈的美味。

夏日的管线沟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泥浆裹着裤腿爬上膝盖，却浇不灭发现蜗牛壳的喜悦。冬夜里趴在窗棂上看父亲巡井，父亲衣角扫起细雪发出的簌簌声，比任何摇篮曲都令人安心。

当我驾车驶过黎明湖大桥，玻璃幕墙折射的晨光里，恍惚看见父亲拄着冰镐的身影。昔日的盐碱滩化作碧波荡漾的景区，抽油机群在芦苇荡中规律颌首，宛如现代版的青铜编钟。

铁人纪念馆的青铜雕像依然保持着昂首向天的姿态，基座缝隙里却钻出了嫩绿的新芽。讲解员说这是地气滋养的奇迹，我却觉得更像是精神血脉的自然延续。那些曾被风雪揉皱的青春，终究在时光长河里舒展成参天巨木。

深夜伏案写作，台灯下投下暖黄光晕。电脑屏幕映着抽油机的剪影，机械臂起落间，我忽然懂得父亲为何总爱凝视井架——那永不停歇的躬耕姿势，恰似黑土地对苍穹的虔诚叩拜。

朋友笑我写作带着石油味，他们不知这正是我最珍贵的创作养分。当笔尖触及这片土地，记忆的闸门便轰然洞开：暴风雪中踉跄巡线的背影，工具箱里发霉的饭盒，暴雨后冒泡的泥浆池……这些碎片在时光窖藏中发酵，终酿成醇厚的精神佳酿。

去年深秋参加同学会，当年油井旁的泥猴们已成为稳重成熟的中年人，说起话来仍带着原油般的质朴。凝视着照片里夕阳下的油田旷野，暮色中的抽油机剪影与星河连成一体。晚风送来若有若无的原油芬芳，那是大地母亲永恒的呼吸。

为什么我的笔尖总饱蘸深情？因为脚下每寸土地都在诉说传奇。当无人机的探照灯照亮夜幕下的旗帜，我看见无数时空在此交汇：铁人在雪原挥舞的旗帜，父亲工具箱里的星光，智能钻井平台跳动的数字……它们终将在时光长河里沉淀成琥珀，见证一个民族向地球深处进军的壮丽史诗。

《祥云》
中国画 吴喜全



照相机的故事

CAMERA



□丰伟

在企业忙碌工作的缝隙里，我始终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小爱好。业余时间，我也会拎上照相机，走向厂区铁路沿线周边的乡村。

田埂间的炊烟、村口的老榆树、劳作的村民、夕阳下的铁轨，都是我镜头里的风景。从沉甸甸的单反相机，到便捷的数码相机，再到如今只剩一架拍立得与一部随身手机，相机换了一代又一代，可那份按下快门时的欢喜，从未改变。我始终觉得，再平凡的人，心底都藏着一份深藏不露的秘密，不张扬，不喧嚣，却能在琐碎的生活里，撑起一片温柔的光芒。

有一位同乡，他扎根生产一线，默默倒班四十年，平日里少言寡语，不到五十岁，却已是满头白发，是厂区内最不起眼的普通工人。他家恰好住在我办公室对面，某天路上偶遇，我一时兴起，提出想去他家坐坐，他腼腆应允，轻轻推开了家门。

那一刻，我彻底怔住了。不大的房间里，整整齐齐陈列着一百多架各式各样的照相机，老式胶卷机、复古旁轴机、经典单反机、数码相机……每一架都擦拭得锃亮，被精心摆放，静静诉说着时光的故事。我从未想过，这位在生产一线默默坚守半生、沉默寡言的同乡，竟是一位照相机收藏爱好者。四十年的倒班生涯，日夜颠倒的辛苦，未曾磨灭他心底的热爱。那些精心收藏的相机，是他对抗平凡岁月的信仰和追求。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末，“傻瓜”相机已经开始流行。那时我突然产生了学摄影的念头，并在大庆市青少年宫报了摄影班。老师说，只有单反相机才能拍出艺术效果。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约同乡杨大森去萨尔图区买照相机。在会战大街逛了一下午，花400元买了一架海鸥照相机。买照相机的同时，售货员又建议：您还应该买个闪光灯，要不然夜间或阴天就无法拍照。也许是年轻气盛，又花98元买了个银燕牌闪光灯。买完这两样东西，我兜里只剩下两元钱。回龙凤区，坐公交的车票钱还是杨大森支付的。为了买这架“海鸥”，花了我近半年的积蓄。

我表哥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我家房子比较宽敞，放暑假，他便把书拿到我家，在西屋看书写作的。有一天，他约了位同学来我家，那个同学穿白衬衫，比较清瘦，文质彬彬的，但他却带了一架120照相机。我的理解，120照相机只能拍十二张照片吧？我表哥约那同学来是要给我家人拍几张照片。记得那天只有我和母亲在家。听说要给我照一张相，我立马跑回屋，把大哥买的“港衫”换上，又着腰，学港台明星的样子拍了一张很酷的照片。其实，表哥约同学来我家，主要是为了感谢我母亲这些天照顾他的伙食起居，为我母亲拍几张照片。我母亲刚开始还有点拒绝，但在表哥的极力劝说下，她还是回屋换了一件比较干净得体的衬衣，在菜园前拍了一张单人照，又与表哥照了合影。

照片洗出来，母亲好像苍老了些，眼角已经有了皱纹，但表情还是多了一些慈祥。

在每一个花开的春天里

□熊燕

听说秀峰公园的海棠开得正艳，我想拍几张照片装扮朋友圈，吃过早饭，挎上相机就出门了。

天气晴好，又是周日，公园里的游客比以往多了不少。海棠聚集在假山前，很多摄影爱好者举着“长枪短炮”。或近或远，或蹲或仰，从各个角度拍摄海棠的美。微风吹过，花瓣簌簌落下，美不胜收，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将这一刻定格。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披着各色披肩，摆着各种姿势，互相或摆拍，或抓拍，成了一道热闹的风景。

我正走着，前面出现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腰间系着学步带的孩童。孩童很调皮，还没学会走路，就急着想跑。跑几步，又回头看看弓着腰，气喘吁吁的母亲。“咯咯咯”笑个不停。那“妈妈，你追我呀”的得意小模样，像极了许多年前的我。

小时候，因为家中无人照看我，母亲每次去“上工”都把我带在身边。而我不是个安分的孩子，每次都不肯好好走路。尤其是春天，田埂上的紫丁香开成一片海，油菜花黄灿灿的，像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我总是兴奋地撒开腿就跑。跑远了，回头看母亲被甩在后面，又折返回去，得意地喊：“妈妈，你追我呀！追到我，我就不跑了。”若是赶时间，母亲便会假装追赶，有时还会超过我，回头俏皮一笑：“怎么样？输了吧。”若是不急，她便不紧不慢跟在我身后，远远叮嘱一声：“小心点呀，别摔着。”

春天的田野，沟渠纵横，有的地方长有滑滑的翠绿色青苔。有一次，我只顾回头看母亲，没留意脚下，一不留神滑进田沟里，脚蹩扭伤，疼得钻心。母亲扔下肩上扛着的秧苗就冲过来，跳下田沟，一把捞起我，抱着就往医生家跑。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母亲的呼吸又急又重，额头的汗珠在春日阳光下亮晶晶的。我从来不知道，母亲能跑得那样快。

从那以后，只要和我一起出门，母亲再也不“不紧不慢”了。她总是小跑着跟在我后面，保持着几步的距离，随时准备伸手将可能

一年后的秋天，母亲身体日渐消瘦，干一点活儿就感觉很累，只能躺在炕上。后来到县医院检查，医生说病情很严重，住了半个月院，又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确诊为肺癌。当时医生也有暗示：母亲的病已无法医治。家人也感觉到了，便给母亲办了出院。父亲单位的吉普车把母亲接回家。在家躺了一个月，十二月初的一个凌晨，母亲溘然长逝。火化后，骨灰盒需要一张照片，找来找去，母亲只有表哥前一年在菜园前拍的一张照片，这也是母亲在中年以后仅有的一张照片。刚开始，骨灰盒在殡仪馆寄存，每年清明、中元节去烧纸时我还能看到母亲的遗像。父亲去世后，父亲和母亲的骨灰都移入了农村的家族墓地，骨灰深埋于地下，我再也见不到母亲的照片了。

1988年冬天，我参加《诗刊》社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的短期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有四百多人。因为学生放假，大家就住在鲁院附近学校的教室里。培训班将要结束，要拍一张合影，我想，四百多人的照片，怎么拍呢？不会用120相机吧？当我们这些学员情绪饱满，层层叠叠地站成了一圈时，摄影师也架好了照相机。我还在犹疑之际，只听那照相机发出“咻、咻、咻”的声音，并开始转动，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为保证摄影成功，摄影师指挥着拍了两遍。后来，我才知道人家那叫转机摄影，就是人多时候使用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转机摄影”。

除了手机，我现在仅有的一架相机就是网购的拍立得了。这还是看电影《夏威夷少年》受到的启发。电影情节大约是这样的：大学生玲雄和女友来到夏威夷岛旅行，邂逅了岛北端镇上的老式影院。半年后，休学的大学生独自回到镇上，在影院担任放映助理。他逐渐融入了当地人简单安逸的生活，和擅长料理又爱恶作剧的比婆婆成了朋友。比婆婆邀请玲雄每天到她家享用美食。享用美食之前，这个单纯、可爱的男孩会用他的快速成像相机把桌上的美食拍下来，挂在比婆婆家的墙上。几个月过去了，玲雄拍的照片竟然挂满了一面墙。看到这布满美食照片的墙，我感觉男孩的生活是慢的，食物的香甜气息容易使人困倦，而整个夏威夷小镇的时光也似乎停止了……

这款紫色木框相机是电影里一件重要的道具，它与男孩的情绪、小镇人的闲融为了一体。这一款相机或许刻意地表达了小镇人与都市人紧张生活的背叛和逃离，因此作为道具的相机和作为主角的男孩才会在弥漫香甜气息的小镇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记忆。

由此我想，一张照片是无足轻重的。但有时候它真的与情感、回忆、现实和未来有关，甚至与时光这样的哲学主题凝结在一起。我觉得，手机、电脑里的几百张、上千张的照片与“真实”的相片就差了很多。我想，那些硬壳相册里的、挂在墙上的、摆在书柜前的老照片也许更有价值……拍立得“吐”出来的照片肯定会让你有一瞬间的惊奇：它不仅可以让让人抚摸，也可以让人眼含热泪地久凝视。

那时没有旅游，但新奇的地方总会让我们心向往之。月初，我们班组把几台运来大修机床拆卸完，在等待配件的几天里，又把满是油渍的工作服洗刷干净。师兄弟们决定去哈麻观光，几位年轻的师傅也应邀同往。

我们出了厂子的南大门，跨过和平路，身手敏捷地就近进入对面厂子的院区，推开沉重的车间大门，鱼贯而入。那是一片宏大的厂房，热气腾腾。百十台纺机同时开启，千万只金梭和银梭在急速编织，年轻的纺织女工们神情专注地忙碌，一片炫目的景象。

还没容我们细瞅，就碰到车间主任。她看了一眼我们工作服上的哈量厂标，客气地为我们带路。看来我们两厂的关系确实不一般。结果她并不是带我们参观，而是引导我们到大门口，送我们出去。原来这个车间的女工们工作时身着短衣短裤，是不允许男士造访的。我们无意间触犯了天条。

不久，我们班组两位年轻的师傅迎娶了哈麻的纺织女工，这不能不与我们那次拉着他们去实地考察调研有关。婚礼前都是我跟着去接的亲。第二年，一位师傅的儿子降生，还是由我给起的名。接着，我的七八位师兄陆续结婚，也都是我去接亲，因为我在班组内岁数最小。

那时的婚礼简单，都是办在窄小的新房里，或是居民大杂院里，但气氛照样热烈，啥事儿也没耽误。年轻人精力旺盛，每次我都是跟着张罗。如果比照现在的豪华婚礼，对应其精心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安排，我大概相当于半个伴郎兼半个司仪。

年轻时盼望成长。入厂后的第三个年头，一个风雪天，人事部的陈师傅披着半截大衣到车间找我。工人出身的干部言语简洁，直接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给我介绍一个好的，不但是先进生产者，长得还特别漂亮。年龄可能比我稍大一点，今年二十八。他又问我今年是不是有二十四五。我说十八。他直愣愣地上下瞅了我一阵儿，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前丢下一句话：这不扯吗！

陈师傅没翻档案就对我认可，说明我在外人眼里是个成熟的人。当天我好奇地到工厂光荣榜橱窗旁窥探了几回。我们是一座万人大厂，先进生产者有成百上千。我实在认不出陈师傅提到的那位姐姐。那个冬天一如既往的寒冷，可我感到有些燥热。

我在工厂工作了八年，也当过一次先进生产者，照片也贴在工厂的光荣榜上。得的奖品是一个印着“奖”字的陶瓷保温杯，一直没舍得用，收藏在柜子里。前不久取出来，摆在面前，看了看。轻轻拧开塑料盖，结果盖已老化，一碰便碎掉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已经流逝。

公交车开出一站地，驶离我们厂区。每一站都有不同的风光。眼前浮现的那些琐碎的往事，如今都应该算是青春的壮丽诗篇。我们从青涩岁月到白发染鬓，也只是短短一站的工夫。人生也像在渡过一条河流，每个人都拼力划着一叶孤舟。艰难困苦和病痛衰老，像一个个漩涡，谁都绕不过去。哪怕是在最无助的时刻，我们也不该轻易松开手中的双桨。

收起目光，打开手机，屏幕上是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兄正在倾情朗诵，口口声声说老了真好。人家说着哈哈，咱也忍不住，反正自个儿认为年轻才是真的好。喷薄的朝阳，使人怀有更多的期待和憧憬。当然，老了仍要好，沉郁的晚霞，那份凄美会让我们无限眷恋。

回望青春

□来勇勤

刷卡乘上公交车，读卡器一声温告知，因为年龄而被优待，心情有点儿复杂。想起临退休的前几天，也是乘公交车，一位大学生起身给我让座。推让了好一阵儿，只好坐了。平生第一次被人让座，很不习惯。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谁想躲都躲不了。

公交车拐上宽阔的和平路，速度加快。我不自觉地握紧面前的横梁扶手，把双脚平行稳住。眼前是美丽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望着那座精致的欧式大门，梦幻般觉得年轻的自己又在那里矫健地走进走出。

大门里面不远处，是我学徒时的机修车间。我也曾肌肉发达，臂力过人。车间门外有一个单杠，工间休息时，我常去做双臂引体向上，一口气可以做几十个。前些日子，我路过小区的单杠，上前试一下，结果一个也没做成。为此，我心里很酸楚。

单杠旁还有一个沙坑，那是我们钳工一组师兄们练习摔跤的场地。有一次，车工组徒工“胖儿”路过，非要和我摔一跤。他高大壮实，是看我精瘦，挑个软柿子捏。我俩相互挽住对方的双臂，分别过了几次招儿。他重如石碾，我脚下有根儿，谁也没摔倒谁。不过，衡量一下双方的块头，胜负应该可以立判。这些年，总被告诫要避免跌倒，弄得人步步惊心。

在工厂的日子是劳碌的，每一天，每一年，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节奏，但我们一双年轻的瞳孔，总是在搜寻不一样的生活。师兄光明时常能帮大家买到哈尔滨电影院的票。这是本市最高档的影院，当时放映一些国外的影片，一票难求。

每当拿到票的日子，师兄们下班顾不上去食堂吃饭，骑着自行车，沿着和平路，拐上中山路，然后一鼓作气跃上红军街的大道上。心中那份渴望，如同后来人们漂洋过海去看世界一样。

同样使我难忘的，是电影散场后，大家再骑着自行车，在影院旁边的十字路口四散回家。每个人的背影都被老式的街灯照耀着，都是那样青春健美，然后隐没在欧陆风情的夜幕中。

那正是爱打扮的岁数。秋林公司进了一批青年式矮腰棉皮鞋，师兄们都很喜欢，结伴去买。当时这里还是二层楼，一行人快步走过洋溢着食品香气的一楼，直奔飘散着皮革气息的二楼。

尽管我试着感觉太紧，而且过于单薄，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付了21块钱。我们班组的一帮师兄，是厂里的帅哥小伙天团。往后的几个冬天，我就是穿着这双虽然不太中用但很中看的鞋子度过的。美丽战胜严寒，青春不怕失脚。

我们工厂和哈尔滨亚麻纺织厂仅一路之隔，都是省里的重点工程。而且当时两厂的“一把手”是一对夫妻，皆为抗战初期投笔从戎的高级干部，因而被人亲切地称为“夫妻厂”。

那时没有旅游，但新奇的地方总会让我们心向往之。月初，我们班组把几台运来大修机床拆卸完，在等待配件的几天里，又把满是油渍的工作服洗刷干净。师兄弟们决定去哈麻观光，几位年轻的师傅也应邀同往。

我们出了厂子的南大门，跨过和平路，身手敏捷地就近进入对面厂子的院区，推开沉重的车间大门，鱼贯而入。那是一片宏大的厂房，热气腾腾。百十台纺机同时开启，千万只金梭和银梭在急速编织，年轻的纺织女工们神情专注地忙碌，一片炫目的景象。

还没容我们细瞅，就碰到车间主任。她看了一眼我们工作服上的哈量厂标，客气地为我们带路。看来我们两厂的关系确实不一般。结果她并不是带我们参观，而是引导我们到大门口，送我们出去。原来这个车间的女工们工作时身着短衣短裤，是不允许男士造访的。我们无意间触犯了天条。

不久，我们班组两位年轻的师傅迎娶了哈麻的纺织女工，这不能不与我们那次拉着他们去实地考察调研有关。婚礼前都是我跟着去接的亲。第二年，一位师傅的儿子降生，还是由我给起的名。接着，我的七八位师兄陆续结婚，也都是我去接亲，因为我在班组内岁数最小。

那时的婚礼简单，都是办在窄小的新房里，或是居民大杂院里，但气氛照样热烈，啥事儿也没耽误。年轻人精力旺盛，每次我都是跟着张罗。如果比照现在的豪华婚礼，对应其精心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安排，我大概相当于半个伴郎兼半个司仪。

年轻时盼望成长。入厂后的第三个年头，一个风雪天，人事部的陈师傅披着半截大衣到车间找我。工人出身的干部言语简洁，直接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给我介绍一个好的，不但是先进生产者，长得还特别漂亮。年龄可能比我稍大一点，今年二十八。他又问我今年是不是有二十四五。我说十八。他直愣愣地上下瞅了我一阵儿，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前丢下一句话：这不扯吗！

陈师傅没翻档案就对我认可，说明我在外人眼里是个成熟的人。当天我好奇地到工厂光荣榜橱窗旁窥探了几回。我们是一座万人大厂，先进生产者有成百上千。我实在认不出陈师傅提到的那位姐姐。那个冬天一如既往的寒冷，可我感到有些燥热。

我在工厂工作了八年，也当过一次先进生产者，照片也贴在工厂的光荣榜上。得的奖品是一个印着“奖”字的陶瓷保温杯，一直没舍得用，收藏在柜子里。前不久取出来，摆在面前，看了看。轻轻拧开塑料盖，结果盖已老化，一碰便碎掉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已经流逝。

公交车开出一站地，驶离我们厂区。每一站都有不同的风光。眼前浮现的那些琐碎的往事，如今都应该算是青春的壮丽诗篇。我们从青涩岁月到白发染鬓，也只是短短一站的工夫。人生也像在渡过一条河流，每个人都拼力划着一叶孤舟。艰难困苦和病痛衰老，像一个个漩涡，谁都绕不过去。哪怕是在最无助的时刻，我们也不该轻易松开手中的双桨。

收起目光，打开手机，屏幕上是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兄正在倾情朗诵，口口声声说老了真好。人家说着哈哈，咱也忍不住，反正自个儿认为年轻才是真的好。喷薄的朝阳，使人怀有更多的期待和憧憬。当然，老了仍要好，沉郁的晚霞，那份凄美会让我们无限眷恋。

